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共同繁荣观^{*}

□ 江时学 周 青

〔提 要〕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共同繁荣观，其主要内涵包括共同发展、普惠包容、合作共赢、成果共享。共同繁荣观指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凸显了发展的重要性，为缩小南北差距确立了大目标，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内涵，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动力。共同繁荣的缺失不利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不利于弘扬社会正义和国际正义，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南北关系，不利于共同应对全球问题，不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局稳定，不利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为了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工作，确保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繁荣观、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周 青，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6) 3 期 0001-1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70）的阶段性成果。

繁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共同繁荣是这一目标的道德内核与最终形态。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化的共同繁荣是指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实现均衡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一种状态。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全球北方）之间的贫富悬殊十分明显，而且久治不愈。这一残酷的现实既损害了国际正义，也破坏了南北合作的信任基础与发展前景。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较多地使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分享增长”（shared growth）、“普惠式增长”（broad-based growth）、“面向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等概念。这些概念表述各异，但核心关切点是通过经济增长提升整体福利水平，并在增长过程中兼顾分配问题。由此可见，他们关心的是增长和发展，认为缩小或消弭南北鸿沟的手段就是加快增长和发展。相比之下，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共同繁荣观既重视共同繁荣的前提（共同发展），也关注共同繁荣的准则（普惠包容）；既强调共同繁荣的路径（合作共赢），也聚焦共同繁荣的核心（成果共享）。换言之，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就是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夯实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根源上化解冲突与动荡。中国的繁荣是人类期盼的共同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是追求一枝独秀，而是希望百花齐放，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共同繁荣观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习近平主席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 2013 年 3 月访问俄罗斯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其中之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1]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其中之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2]

共同繁荣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共同繁荣是指一个国家的全民共富，其核心要义是一国的全体人民能够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受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标。在国际层面，共同繁荣则着眼于全球视野，倡导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秉持平等、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加强经济合作，共享科技进步的成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挖掘发展机遇，不断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

应该指出的是，国内层面的共同繁荣与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内层面的共同繁荣为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能力的支撑，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则为国内层面的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毫无疑问，国内层面上的共同繁荣不仅关乎一国经济的稳健增长，而且涉及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与人民幸福指数的关键指标。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既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也能促进全球治理；既能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能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既能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能改善南北关系。因此，实现国际层面上的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共同繁荣观的内涵主

[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共同发展是共同繁荣的前提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因而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只有加快发展，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才能积累可供分享的财富。因此，共同发展为共同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历史与现实已充分昭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各国利益交融、兴衰与共的正和博弈。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互交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任何试图将他国排斥在发展之外的孤立行为最终都将反噬自身。只有实现共同发展，才能释放全球经济潜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1]“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2]

（二）普惠包容是共同繁荣的准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449 页。

[2] 同上，第 433 页。

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1] 确实，繁荣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盛宴”，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普惠包容正是世界各国在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成就时应该奉行的准则。这一准则强调的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这一准则并非追求发展水平的绝对均等，而是要求尊重各国发展差异与自主选择，摒弃排他性政策，通过平等对话、互助协作，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支持，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以缩小全球发展鸿沟，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三）合作共赢是共同繁荣的路径

发展从来不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演绎的交响乐。合作共赢倡导的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使各国在相互成就中共同进步，在优势互补中共享机遇。此外，合作共赢打破了零和博弈的片面思维，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尤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利益深度交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实现繁荣。同样重要的是，合作共赢能够汇聚起最广泛的力量，鼓励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都能在合作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这种众志成城的合力，正是推动共同繁荣最强劲的引擎。习近平主席用“陆锁国”“陆联国”“拉一把”“赠人玫瑰”等生动的比喻阐述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2]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3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 464 页。

（四）成果共享是共同繁荣的核心

共同繁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愿景，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正是这一愿景最本质的体现。这一愿景回答了“经济为谁增长”“繁荣为了谁”等根本性命题，体现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正义感和国际责任。换言之，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仅为少数国家独享，那么，无论这一成果多么耀眼，都只能是局部的繁荣或少数国家的繁荣，与共同繁荣相去甚远。如果发展只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如果增长的果实只为少数国家垄断，那么世界将陷入贫富分化、矛盾丛生的泥淖，共同繁荣便无从谈起。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1]

二、倡导共同繁荣观的时代意义

共同繁荣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既有“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也有“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共同繁荣观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高度，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将世界各国的共同福祉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目标之一。

共同繁荣观强调了人类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换言之，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世界经济的持久增长和财富的不断累积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世界才能更好地发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富者愈富、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 153 页。

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1]。

在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倡导共同繁荣的理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指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2] 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观反对以邻为壑的经济霸权，倡导通过做大“蛋糕”来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并主张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通过深化互利合作、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型发展格局。因此，共同繁荣观不仅超越了零和博弈的经济霸权思维，而且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凸显了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是共同繁荣的前提与基础，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硬道理”；共同繁荣是发展的最终指向与归宿，也是衡量发展质量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以发展为动力的。因此，为了实现共同繁荣，必须加快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当今时代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发展不充分造成的。”^[4] 他还强调：“要把发展置于国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88 页。

[2] 同上，第 133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23 页。

[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 232 页。

际议程中心位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1]

（三）为缩小南北差距确立了大目标

南北差距难以缩小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既不利于改善南北关系，也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共同繁荣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改革，打破长期以来制约南方国家发展的技术垄断、金融壁垒与规则不公，使南北关系从单向性依附转向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2]

（四）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内涵

一方面，弥合全球发展鸿沟和缩小南北差距是全球南方的追求；另一方面，南南合作旨在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资源共享和能力共建，实现集体性发展跃升。这与共同繁荣观倡导的合作共赢和“不让任何一国掉队”的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合作，帮助我们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发展繁荣之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南南合作必将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崛起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持久、平衡、包容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3]他还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4]

[1] 《习近平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2年6月2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6/24/content_5697592.htm。

[2] 同上。

[3]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7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7/c_1116689451.htm。

[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43页。

（五）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观念上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交往。但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势力之强大，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习近平主席将其称之为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毫无疑问，这一“回头浪”来自多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不同。因此，如何使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努力实现共同繁荣，是遏制反全球化的“回头浪”、推动全球化的关键所在。

三、实现共同繁荣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依赖于财富的创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与日俱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二十一世纪初，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十九世纪初的8倍；在1820年至2010年间，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约10倍。^[1]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用大量数据说明，人类社会在第一个千年，人口仅仅增长了约17%，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但在第二个千年，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尤其在18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1998年的人均收入比1820年高出8.5倍。^[2]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的研究同样表明，

[1] Jan Luiten van Zanden et al., eds., “How Was Life? Global Well-Being Since 1820,” OECD, 2014, p.32,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4/10/how-was-life_g1g43e0f/9789264214262-en.pdf.

[2]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2006, p.29,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06/09/the-world-economy_g1g-h69e4/9789264022621-en.pdf.

在1820年前，财富的增长极其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此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1]

繁荣的对立面是贫困。受多种国内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对贫困的认知和界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衡量贫困的尺度显然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了进行国际比较，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PPP)为依据，将贫困线(poverty line)确定为平均每天维持生计的开支低于1美元。^[2]此后，世界银行多次提高贫困线的标准，2025年6月确定为3美元。根据这一标准，世界上约有8.3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由此可见，虽然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在增加，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悬殊并没有消失。根据世界银行每年7月公布的数据，2025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平均数仅为1135美元，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则高达13935美元。^[4]2024年，布隆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19美元，而摩纳哥则高达28.8万美元，两者相差巨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认为，虽然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在减少，但全球范围内的不公平依然很严重。^[5]世界银行出版的《2024年贫困、繁荣与地球报告》甚至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减贫进程已几乎停滞不前，2020年至2030年将成为“失去的十年”。^[6]

[1] 18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无疑是欧洲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参见威廉·伯恩斯坦：《财富的诞生：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易晖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2]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7.

[3] “Factsheet: June 2025 Update to Global Poverty Lines,” The World Bank, June 5,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actsheet/2025/06/05/june-2025-update-to-global-poverty-lines?>.

[4] “Understanding Country Income: World Bank Group Income Classifications for FY26 (July 1, 2025–June 30, 2026),” The World Bank, July 1, 2025,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opendata/understanding-country-income--world-bank-group-income-classifica>.

[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Next Fronti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20, p.121.

[6] “Poverty, Prosperity, and Planet Report: Pathways Out of the Polycrisis,” The World Bank, 2024,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67cc31d7-583a-47fa-9e02-ca7a2914f1a1/content>.

为了消除或减少贫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例如，2015 年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通过了著名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议程明确指出：“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议程确定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1]

应该指出的是，也有人认为，南北差距在缩小。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Ngozi Okonjo-Iweala) 在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2024 年世界贸易报告》的序言中指出，由于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收入得到了强劲的增长，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 1995 年的 40% 下降到 2022 年的不足 11%。她认为，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贫穷国家首次开始缩小与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2] 美国学者罗山·潘迪安 (Roshan K. Pandian) 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球不平等显著下降，扭转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上升趋势。但在南北不平等和南北差距为什么缩小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良好的趋势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许多人相信的所谓“穷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全球化”，而是因为富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3] 还有人认为，这一良好的趋势应归功于人口规模约占世界总人口 40% 的中国和南亚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4]

且不论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得到了缓解，可以肯定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

[1]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2015,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2] “World Trade Report 2024: Trade and Inclusiveness - 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Al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4, p.6,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r24_e/wtr24_e.pdf.

[3] Roshan K. Pandian, “The Decline of Global Inequa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econsider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9, No.5, 2024, p.1493.

[4] Glenn Firebaugh and Brian Goesling, “Accounting for the Recent Decline in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0, No.2, 2004, p.283.

一是不利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共同繁荣的缺失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已成为危害世界和平的安全问题。这一危害性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多维度的复杂机制，其核心逻辑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共同繁荣的缺失蕴含的结构性不平等，会激化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国际合作的基础，刺激有组织犯罪（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和武器走私），甚至还会产生美国学者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等人所说的“相对剥夺感”。^[1]众所周知，长期困扰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毒品走私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都与美拉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有关。例如，为了遏制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美国经常性地对拉美动武或用武力威胁，破坏了拉美在本地区构建“和平区”的美好愿望。^[2]

二是不利于国际社会弘扬正义。正义即天下之公义，既体现了公平、公正、平等和善良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也蕴含了人类应该具有的体恤弱势群体和对其表达怜悯之心和恻隐之心的精神内涵。因此，正义是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通常被看作德性之首；康德坚信，一旦公正和正义沉沦，人类就不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疑问，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贫富鸿沟得不到弥合，那么，国际社会应该秉持的正义必将荡然无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会公然取代本应普照全球的正义之光，我们今日的漠视与不作为必将成为后代子孙难以承受的历史重负。

[1]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萨缪尔·斯托弗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这一理论假设认为，人们常将自己的处境与自己想象中的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如果比较后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感觉产生的消极情绪会演变为不满、怨恨和愤怒，进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 Samuel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Samuel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I: Combat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Robert King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Walter Garrison Runcima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2] 2014年1月28—29日在古巴举行的第二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宣告，拉美国家决心在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不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使拉美成为一个“和平区”。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拉美发出这一庄严的宣告。

三是不利于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全球问题数不胜数。尤其在最近一二十年，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网络安全威胁激增以及传染病的蔓延等全球问题不断恶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正是因为这些全球问题具有全球性的特点，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共迎挑战。毫无疑问，共同繁荣的缺失以及南北鸿沟的扩大，必将损害这一合作。

四是不利于构建和谐南北关系。诚然，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与其内部的多种因素（如政局不稳定、经济政策失当以及社会问题严重）息息相关。但外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和技术等领域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正如许多依附论学者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对称性，其本质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显然不利于改善南北关系，而且使双方陷入信任危机。

五是不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贫困，无法实现共同繁荣，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外向性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包括高附加值产品、服务、技术和奢侈品。如果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性的贫困陷阱，其消费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市场就难以扩大，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提速。

六是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局稳定。贫困意味着各种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差，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面对这样一种不良局面，不同社会群体（有时甚至是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都会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地展开博弈和争夺，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也会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局稳定难以为继。应该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不稳定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发达国

家也因此难以独善其身。例如，2010年和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后，一些西亚北非国家的政局不稳定致使大量难民进入欧洲，使欧洲在此后不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中美洲国家的贫困问题使许多人为生计而被迫背井离乡，使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线面临巨大的压力。特朗普政府用巨资在边境线上建高墙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七是不利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全球南方的贫困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繁荣的缺失，会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导致全球南方的购买力得不到提高，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无法拓展海外市场；二是导致全球南方的经济脆弱性得不到改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难以强化，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长失去持久的动力和稳定性；三是导致全球南方参与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生产链的能力无法得到增强，从而使发达国家难以发挥自身在资本和技术等领域的优势。总之，正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指出的那样，全球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灾难必然会对发达国家产生反噬效应。^[1]

由此可见，共同繁荣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诉求，也是应对全球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必由之路；既是弥合南北贫富差距的重要基石，也是人类共存的前提。换言之，正是因为共同繁荣的缺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危害，所以，世界各国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努力缩小南北差距或弥合贫富鸿沟，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让子孙后代免受今日不公的恶果，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还应该强调，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大不相同的是，共同繁荣观的内涵强调共同繁荣的前提（共同发展），坚守共同繁荣的准则（普惠包容），追求共同繁荣的路径（合作共赢），进而彰显共同繁荣的核心（成果共享）。

[1] “General Assembly Fifty-eighth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11th Plenary Meeting,”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5, 2003,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03/531/33/pdf/n0353133.pdf>.

四、中国为构建共同繁荣世界作出的贡献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的繁荣承载着人类对共同繁荣的深切期待。中国始终秉持兼济天下的胸怀，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而是致力于百花齐放，与发展中国家并肩前行，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一倡议的要点是“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这一倡议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共同繁荣的向往，也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既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各国追求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是高度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工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问世后不久，中国就在2016年4月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并先后在2016年10月和2017年4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由于这一议程囊括发展的多个领域，因此，中国政府成立了由数十个政府机构参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并将落实2030年议程纳入“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中长期发展战略。此外，中国还发布了多个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报告。这些报告不仅介绍了中国落实这一议程的进展和经验，而且还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

三是确保中国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关口，2025 年达到 140.19 万亿元。^[1] 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以及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作为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能确保本国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对世界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四是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和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了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更多的外资，中国制定了行动方案，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措施，如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加大政策力度，提升对外商投资吸引力；优化公平竞争环境，做好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畅通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内外资企业创新合作；完善国内规制，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些措施无疑为其他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五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为实现共同繁荣奠定物质基础。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合作已从最初的亚欧大陆延伸到遥远的非洲和拉美，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 各方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使“一带一路”从构想走向实践，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李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新华网，2026 年 3 月 5 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305/2dec3fbdfc16487592038bd047bb2aaa/c.html>。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2026 年 6 月 17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606/t20260617_994999.html。

从宏观规划的“大写意”阶段迈向细致落实的“工笔画”阶段，基本实现了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预期目标，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是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讲信义、重情义、行仁义、扬正义、立道义，是中华文明深植的文化基因和鲜明的民族品格，也是推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国家百废待兴，财政紧张，但依然坚守着这些原则，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与胸怀向有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除了力所能及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以外，中国还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授手工艺技术，并大力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南合作而开展的工作。

七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问题的应对之道就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多种多样的全球问题不仅破坏了国际经济关系，而且削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道义层面上，中国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治理经济观；在制度层面上，中国提出了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国）共同发力，成功地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1月同意对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在规则层面上，中国推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此后又在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在2024年提出了《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在政

策层面上，中国提出了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以避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1]在工作层面上，中国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牵头设置了《投资便利化协定》，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并带头完成国内核准程序。

八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积累能力弱而无法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使经济增长面临着难以破解的“瓶颈效应”。为帮助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基础设施投资，2013年10月，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年1月，该行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6月，它已拥有110个成员国，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GDP。^[2]作为最大的股东，中国充分展现了国际公信力和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坚定支持该行恪守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的原则，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运作。截至2025年6月，它为38个成员的300多个项目提供了610亿美元的融资，覆盖交通、能源、水资源、卫生等领域。^[3]

五、结语

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与追求。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南北差距、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冲突交织叠加，使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的这一宏伟目标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世界各国不应该丧失信心，而要继续恪守合作

[1]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金融》2009年第7期，第8页。

[2] “AIIB’s First Decade Marks a Path of Multilate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Xinhua, June 24, 2025, <https://english.news.cn/20250624/674e003651c8476eb6a00ca51a6b3b2a/c.html>.

[3] 《践行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观察》，新华网，2025年6月26日，<https://www.news.cn/20250626/15dfd114fb0b4996a00d66c575d8881d/c.html>。

共赢、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努力使这一目标早日实现。

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胸怀。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将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推进共同繁荣。”^[1] 无数事实表明，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更加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益。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坚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务实举措，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注入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为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提供了众多机遇，也使其能充分享受中国发展的成果。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308页。